

中国文化中的共情：差序格局的影响*

朱旭 杨雪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要 共情作为一种人际反应深受文化背景的影响。然而, 中国文化如何具体地形塑共情仍未被揭示。本文以“差序格局”为框架, 分别阐述亲疏与尊卑两个维度对共情的影响机制。在亲疏维度, 集体主义文化中人际关系的高度融合可能会模糊共情所需的心理边界; 而在尊卑维度, 儒家文化等级化的伦理秩序则可能与共情所需的平等关系相冲突。总体而言, 中国文化中的共情呈现三个特征: 含蓄间接的情感表达、整体性与理性化的认知方式以及问题解决导向与行动化。本文还从文化的视角为社会生活中的共情实践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 共情, 中国文化, 差序格局, 亲疏, 尊卑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分享并理解他人思想和情感的能力, 包括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行为共情等主要成分(Preston & de Waal, 2002)。研究表明, 共情在促进人际联结、增加亲社会行为、提升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丁凤琴, 陆朝晖, 2016; Klimecki, 2019)。无论对于个人、家庭还是社会而言, 共情总是被期望更多地发生。然而,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西方典型的共情表达却并不常见。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的共情模式通常强调直接的情感确认和言语表达, “我理解你的感受”、“我能体会你的痛苦”之类的情感反映是共情的常见表达方式(Hill, 2019)。这种表达方式建立在清晰的个人边界的基础上(Decety & Lamm, 2006), 认为每个人有独立的情感世界, 共情就是通过认知理解和情感共鸣来跨越边界。相比之下, 中国人的共情表达往往更间接并嵌于行动之中(Taylor et al., 2004)。例如, 当发现朋友心情不好时, 我们倾向于约着一起吃饭或逛街购物来表达关心; 父母在辅导子女作业时

可能因难以理解孩子的感受而情绪失控; 长辈和上级更倾向于为处于困境中的晚辈和下属提供建议方法而不是谈论感受。这些日常差异暗示, 共情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能力, 更是一种深受文化脚本塑造的沟通实践。

现有的共情的跨文化研究多集中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比较。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和谐与相互依存, 而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独立性和自我实现(Markus & Kitayama, 1991)。一些研究发现, 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总体上表现出更高的共情水平(Chopik et al., 2017), 但这种共情表现出显著的关系边界性与情感复杂性, 即个体往往倾向于对内群体成员共情, 对陌生人共情较弱(Cheon et al., 2011), 且共情成分中包含有更多自我导向、伴随回避动机的“个人痛苦”, 而非他人导向、促进利他行为的“共情关注”(Batson et al., 1987; Cassels et al., 2010)。也有研究报告, 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更依赖认知共情, 情感共情水平低于个人主义(Atkins, 2014)。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一方面源于共情概念本身的复杂性, 不同研究侧重于共情的不同成分, 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化, 无法充分反映文化内部的复杂性。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为理解文化差异提供了宏观框架, 但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例如,

收稿日期: 2025-09-25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CCNU24ZZ038)。

朱旭、杨雪共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 朱旭, E-mail: xzhu@ccnu.edu.cn

日本的集体主义侧重于社会角色与情境适应; 拉美国(如墨西哥、波多黎各)更突出家庭情感联结, 而非普遍的群体义务; 中国的集体主义则表现为重视群体和谐、履行家庭责任以及对权威的遵从(Oyserman et al., 2002)。这些差异源于各国不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背景, 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自我建构、认知方式与情感体验(Han, Kim, & Yoshiyuki, et al., 2016; Kikutani et al., 2024), 也通过内在规范与脚本系统性地影响着共情的不同方面, 包括个体如何理解、诠释并回应他人的痛苦(Cheon et al., 2010; Woolrych et al., 2020)。不同文化对共情表现形态的精细塑造仍需通过更深入的民族志与研究实践予以揭示(Hollan, 2012)。然而, 目前针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共情研究仍较为匮乏。

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共情首先需要能反映中国文化特征的理论框架。相比于集体主义, 差序格局更能体现中国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与实践规则。因此, 在差序格局的框架下审视中国文化中的共情现象将更具文化阐释力与理论适应性。

2 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最早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948)中提出, 用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他以“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为喻, 指出中国社会是以“己”为中心, 通过血缘、地缘和人伦关系逐步向外扩展所形成的弹性伸缩网络。差序格局的概念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建构逻辑, 其外在表现为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差序化人际网络; 内在则通过礼制规范与角色期待, 将这种社会模式内化为个体的认知与情感图式(袁晓劲, 郭斯萍, 2017; 翟学伟, 2018)。因此, 差序格局不仅是对社会格局和人际关系的描述, 更是一种根植于文化的实践逻辑和被内化的心理特征(张江华, 2010)。

差序格局包含了中国人不同的关系状态。黄光国(1985)依据差序格局中对不同圈层关系对象差等对待的原则, 区分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与“混合性关系”, 并指出各类关系所遵循的不同交往法则。在差序格局中, 由内而外, 情感性成分不断降低, 工具性成分不断提高, 中间地带则是情感性成分与工具性成分相混合的区域。杨国枢(1992)进一步将关系类别细化, 提出“家人关

系”、“熟人关系”与“生人关系”的划分, 认为个体对不同关系对象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认知与行为反应模式。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一个立体的结构, 不仅包含水平维度的“差”(亲疏远近), 还有垂直维度的“序”(尊卑上下)(阎云翔, 2006)。翟学伟(2018)指出, 尽管“水波纹”的意象突出亲疏延展, 但差序格局的理论建构中实际包含了社会垂直向度的等级考量, 如君臣、父子、贵贱、上下。根据儒家伦理, 个体与其他人交往时, 应当从亲疏和尊卑两个认知向度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 依照“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原则给出差序性的反应, 才能“不失其伦”(黄光国, 1995; 庄耀嘉, 杨国枢, 1997)。这种关系维度的划分也常见于西方研究。例如, 在 Leary (1957) 的人际互动环模型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Model) 中, 友好-敌对 (Affiliation-Hostility) 维度代表个体在情感层面的亲近或疏离倾向, 支配-顺从 (Dominance-Submission) 维度则反映个体在互动中对“地位”信息的处理。

综上所述, 亲疏与尊卑作为人际关系的两个基本维度普遍存在于中西方文化对关系的认知之中, 但二者在具体内涵、耦合方式与实践形态上则呈现出文化差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一个融“差”、“序”于一体的立体理论框架。它不仅阐释了儒家以“人伦”为核心的、具有弹性的亲疏关系网络, 也揭示了由“礼”所规范的动态尊卑秩序, 反映出中国人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认知与情感逻辑特征。因此, 从差序格局的视角研究共情的价值在于: 一方面能超越“集体主义”的概括性描述, 深入揭示中国社会关系模式与人际互动规范对共情的具体形塑机制; 另一方面, 通过将“差”与“序”操作化为可分析的维度, 也提供了与西方共情相关理论和研究进行对话的基础。以下将分别从亲疏与尊卑这两个维度系统探讨其对中国文化语境中共情的影响机制。

3 差序格局下的共情

3.1 亲疏对共情的影响

与中国文化中的亲疏概念对应的是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内外群体和关系亲密度的研究。现有研究一致表明, “平等地共情”只是一种道德理想而非心理现实, 共情表现出稳定的亲疏偏向: 在

家人、朋友、同乡到同胞等不同关系对象中，个体始终倾向于对关系更近的人共情(Fowler et al., 2021)。种群相关研究也发现，内群体身份稳定地影响共情的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并促进对内群体成员的共情(Eres, 2022)。神经科学研究则证实，个体对内群体成员的痛苦有更快、更强烈、更一致的神经反应(Azevedo et al., 2013; Gutsell & Inzlicht, 2012; Han, 2018)。这一现象在日常经验中也得到印证：57%的共情体验发生在被试认为与自己“非常亲密”的人之间，仅6%的共情体验针对“完全陌生”的人，而且被试报告的共情程度随亲密程度显著增加(Depow et al., 2021)。另一些研究考虑了共情的认知损耗，发现人们有时会回避共情，然而关系对象会调节这一倾向。例如，个体对母亲选择共情的概率显著高于陌生人(Li et al., 2022)；一个更熟悉或喜欢的共情对象会和金钱奖励一样，能够有效激励被试选择共情(Ferguson et al., 2020)。此外，亲疏不同的对象可能涉及不同的共情方式，尽管共情的认知和情感部分可以相互促进和转化(Vorauer, 2013)，但神经影像学研究也表明，个体对朋友的痛苦进行共情主要依赖于情感共享，涉及背前扣带回和岛叶；而对陌生人的痛苦共情则更多地依赖于心智化系统，激活背内侧前额叶皮层、楔前叶和颞极(Meyer et al., 2013)。

共情的亲疏梯度可能与个体在认知表征中将他人纳入“自我”的程度密切相关。Aron等人(Aron et al., 1991; Aron & Aron, 2010)提出，个体通过将关系中的他人纳入自我以实现自我扩张，这一过程在产生亲密感的同时，也导致了自我的特质和记忆与他人混淆。随着关系亲密程度的提高，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边界也在模糊，这解释了为什么与亲密他人的情感共享会直接激活与自我体验相关的脑区(Meyer et al., 2013)，以及为什么大脑对亲密他人的痛苦表现出替代性疼痛(Bucchioni et al., 2015; López-Solà et al., 2020)。

许多西方学者强调，共情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他人区分(Eklund & Meranius, 2021; Krol & Bartz, 2022)，这决定了个体在体验和感受他人心理状态的同时不会混淆自我和他人(Coplan, 2011; Decety & Lamm, 2006)。保持双方之间认知和体验的清晰边界被认为是共情与同情(sympathy)、怜悯(compassion)和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的区别(Hollan, 2012; Singer & Klimecki, 2014)。研

究发现，缺乏自我-他人区分时，共情过程伴随着更多的个人痛苦(Krol & Bartz, 2022; Meyer et al., 2015)，这种自我中心的情绪反应被认为是情感共情中消极的一面，会阻碍而非增强亲社会互动(Kim & Han, 2018)。由于个人痛苦通常伴随着回避动机，个体会倾向于从共情情境中抽离，以缓解自身情绪负担(Batson et al., 1987; Batson & Shaw, 1991)。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在面对他人痛苦时，能够在维持或提升共情关注的同时调节并缓解自身痛苦体验的能力反映了“共情韧性”(empathic resilience)，是共情行为得以持续的关键(Lehmann et al., 2026)。

然而，在差序格局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常常是过度融合而缺少自我-他人区分的。中国人不像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那样谨慎地维持个人边界(Triandis, 2001; Triandis et al., 1988)，相反，中国文化中的“亲密”往往表现为个体边界的模糊、淡化以及两个人之间“不分你我”的状态(Friedman, 2005; Yan, 2016)。有研究者认为，差序格局反映的不仅是外在的关系层次，还是内化的自我建构(王振东, 2021)。实证研究也显示，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更多地包含母亲等亲密他人(张力等, 2005; Zhu & Han, 2008)。不仅如此，母亲(Wuyun et al., 2014)、配偶和子女(Han, Ma, & Wang, et al., 2016)、恋人(周丽, 苏彦捷, 2008)、朋友(管延华, 迟毓凯, 2006)等都不同程度地与个体共享自我神经表征。这种关系中普遍存在的自我-他人融合可能导致中国人在共情时因过度卷入而体验到更多的个人痛苦。马璐瑶(2020)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更常以建议、分析等方式回应他人困境，而典型的共情反应相对较少。夏萌(2022)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的助人观念以解决问题为主要导向，其回应方式受亲密度影响，关系越亲密，越倾向于提供建议和分析。杨雪(2023)则发现，想象不同关系对象处于不幸情境时，相较于陌生人和熟人，亲密他人能唤起被试更强烈的不安、焦虑等个人痛苦情绪。这些研究结果提示，中国人可能将安慰、建议等理性化的回应方式作为情感回应的替代，从而避免深入共情对方的内部世界而产生的情绪负担。

研究还发现，关切、同情等对他人的共情性情绪更多自动发生于熟人之间(杨雪, 2023)，这说

明中等程度的自我-他人融合关系可能比高度融合的亲密关系更有利于共情发生,这种适度的关系距离为共情者提供了在“融合”和“区分”之间灵活切换的心理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发生在心理咨询中的共情可能也得益于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兼具亲密与界限的特殊关系状态(江光荣, 2012)。咨询师既因分享了来访者的私密体验而与之极度亲密,又因双方的契约关系和专业设置而能保持彼此区分,创造了共情的理想条件(Zhu et al., 2025)。良好的共情有赖于在自我-他人的融合与区分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在中国文化中实践共情的一项重要挑战是如何在亲密关系中维系必要的心理边界。例如,在中国家庭中,成员的关系往往由于过于紧密反而难以共情,面对亲密他人的痛苦,个体体验到的往往是自我感受与他人情绪未经分化的混合反应,难以厘清情绪来源,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家庭关系中典型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现象。若家庭成员间能够增强自我-他人区分,将彼此视为更独立的个体,则更有可能为视角采择和建设性沟通留出心理空间,从而增加共情机会。

3.2 尊卑对共情的影响

中国文化中的尊卑类似于西方的社会等级,后者通常是依据物质财富、个人能力等一种或多种价值维度形成的个人在群体中相对地位的排序(Redhead & Power, 2022)。有关社会等级对共情影响的研究表明,社会等级会显著抑制人际情境中的共情过程,包括文化中的权力距离¹、个体的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²,以及具体情境中的等级差异(Cheon et al., 2011; Lucas & Kteily, 2018)。研究发现,高权力距离也增加了社会中的人际距离,减少了利他行为(Fu et al., 2021; Lammers et al., 2012)。相较于平等主义者,高SDO的个体表现出更少的共情相关脑区的神经活动(Chiao et al., 2009),并拥有更高的漠视他人的暗黑三特质,即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Ho et al., 2015)。研究还发现,等级中的权力拥有者对他人行为的镜像反应较弱,说明权

力感抑制了共情相关的神经基础(Hogeveen et al., 2014);并且高权力者会通过自主神经调节抑制情绪反应,对他人痛苦的回应更少(van Kleef et al., 2008),更少进行观点采择(Galinsky et al., 2006),判断他人情绪时共情准确性更低(Kraus et al., 2010)。这些结果提示了权力和社会等级对共情的阻碍作用。

等级制度的核心在于区分,通过社会地位、权力、资源控制等标准对个体或群体进行明确的分层(Magee & Galinsky, 2008)。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中,也体现在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中(Lammers et al., 2008)。对社会地位信息的加工涉及背内侧前额叶(dmPFC)、前扣带回(ACC)及杏仁核等脑区(Chiao, 2010; Zink et al., 2008),这些区域同时参与情绪、自我参照及心理理论过程,从而为尊卑影响共情提供了潜在的神经耦合路径。社会地位的变化调节了与奖赏、压力及社会认知相关脑区的活动与可塑性(Utevsky & Platt, 2014; Wang et al., 2014),这提示长期处于特定社会等级结构可能对共情相关的神经功能产生适应性塑造。研究发现,所处社会等级的不同引起了个体神经反应方式、应激反应等特质差异,如高权力者往往共情淡漠(Hogeveen et al., 2014),而低社会等级者对他人行为更为敏感和关注(Stellar et al., 2012)。此外,个体可能通过特定行为和认知方式来巩固和维持自身的社会等级(Magee & Galinsky, 2008),如倾向于对更高等级的人进行观点采择,从而实现资源积累和自身等级提升(Keltner et al., 2003),并更少共情低社会等级的对象,倾向于将其痛苦归因于个人因素,而非外部环境(Sidanius et al., 2013)。此外,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和动机的不同使得个体对不同群体所受伤害的感知程度不同,这也导致了群体间共情差异的产生(Lucas & Kteily, 2018)。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个体会出于维系或抑制等级差异的目的,有选择地对一些群体(例如内群体)共情而对另一些群体反共情(如幸灾乐祸)(Hudson et al., 2019; Lucas & Kteily, 2018)。正如Keltner (2016)关于权力与共情关系的论述,共情的能力帮助个人在群体中获取他人的支持并提升自身地位,助力了等级差异的形成,然而这种等级差异的鸿沟却反过来使得不同等级群体之间的彼此认同和共情变得更为困难。

¹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反映了文化价值观中对不平等的接受度。

² 社会支配倾向是指个体偏好社会等级而非平等主义作为社会结构的指导原则。

与这种等级区分相悖的是，共情的发生往往伴随着自我-他人融合。研究发现，个体能够通过观点采择实现对另一个人的融合或扩展，增加与他人的一体性(eness)以及自我认知表征与他人认知表征的重叠程度(Cialdini et al., 1997; Davis et al., 1996)。共情行为能够增加与他人的感知相似性，特别是对那些弱小和脆弱的群体(Oveis et al., 2010)，而想象自己在他人的位置，在内隐和外显层面均减少了对他人的刻板印象(Galinsky et al., 2005; Galinsky & Moskowitz, 2000)。因此，共情时与他人的融合不仅在横向的亲疏维度上拉近双方关系，还意味着纵向的等级和身份差异的消弭。

相较于西方的社会等级，差序格局中的尊卑是一套更为复杂的伦理纲纪体系，它先于个人存在，并具有强制约束力(黄光国, 2014; 阎云翔, 2021)。“礼”作为儒家伦理规范的核心，要求人们在不同的关系中履行不同的、有差等的责任，通过各安其分、各守其责维持等级秩序(黄光国, 1995; 马戎, 2007)。例如，《礼记·礼运》中讲“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强调了不同角色对应的义务。《孟子·滕文公下》则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观念，用以说明不同关系中应遵守的人际规范。在人际交往中，个体须根据自身在特定关系中的角色位置，不断衡量言行的适当性并及时调整，以确保符合相应的礼仪规范(Hwang, 2001)。即便在当代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这种礼仪规范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行为模式(陆洛, 2003)。而“共情”意味着进入对方的内部世界，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与对方达成“融合”或“一体”的状态，这与强调尊卑秩序的关系结构相冲突。忽视角色位置与伦理规范的情感表达，不仅可能被视为失礼，甚至可能构成对既有关系秩序的冒犯。

尹娜(2024)考察了中国学校、企业和家庭中的尊卑角色对共情的影响发现，相较于存在传统尊卑身份差异的关系(如师生、长幼、上下级)，个体对同学、同辈、同事这类身份平等者表现出更高的共情意愿和共情水平，并且在学习和表达共情后，个体与共情对象之间的自我-他人融合水平提高，心理社会等级距离缩小了。这一发现佐证

了个体角色身份和尊卑秩序对共情的阻碍作用，说明了共情更多与平等相伴。研究结果也启示了传统亲子、上下级关系中共情困难的原因，即在关系中维系权威的形象会阻碍共情及其表达(Zhu et al., 2025)，当互动双方能放下角色，以平等的身份沟通交流时，共情将更容易产生。

综上所述，个人主义文化下的共情概念要求保持一定的自我-他人区分，且隐含着双方平等的前提。但在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下，个体在亲疏维度与内群体相互依存过于融合，尤其在亲密关系中不分你我，难以做到自我-他人区分，使得共情过程总是伴随着个人痛苦；在尊卑维度则承袭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规范，角色差异阻碍了对彼此的理解和情感表达。图1呈现了在差序格局的亲疏和尊卑维度中处于不同关系距离的个体如何达到最佳共情距离的策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分别阐述了亲疏与尊卑对共情的影响，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重要的人际关系(如亲子、师生)天然地融合了亲疏与尊卑的双重维度。这意味着对一些关系对象的共情，如父母或权威长辈，其过程则不可避免地受到双重影响。本文在综述文献时，已尽可能对研究所涉对象的关系类型进行说明与区分，以帮助更准确地理解其适用范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双重影响可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更为突出。在关系结构相对情境化的西方社会，亲疏与等级常被视为可在不同场合中相对独立运作的维度(Fiske, 1992)，而华人社会的关系认知则更具系统性与整体性。庄耀嘉与杨国枢(1997)的研究指出，亲疏与尊卑共同构成了华人关系认知的基本框架，并定位了亲子、夫妻、朋友等二十余种常见关系类型在二维格局中的分布。遗憾的是，现有实证研究大多仅关注单一维度的独立效应，对两者如何交互影响共情仍缺乏深入探讨。未来研究有必要在此方向上进一步展开，系统考察两个维度的交互机制，从而更完整地揭示中国人共情的社会文化逻辑。

4 中国人的共情表达

差序格局中的亲疏与尊卑维度为认识中国人的共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然而，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共情，还必须深入其文化心理根基。自共情概念诞生以来，西方心理学从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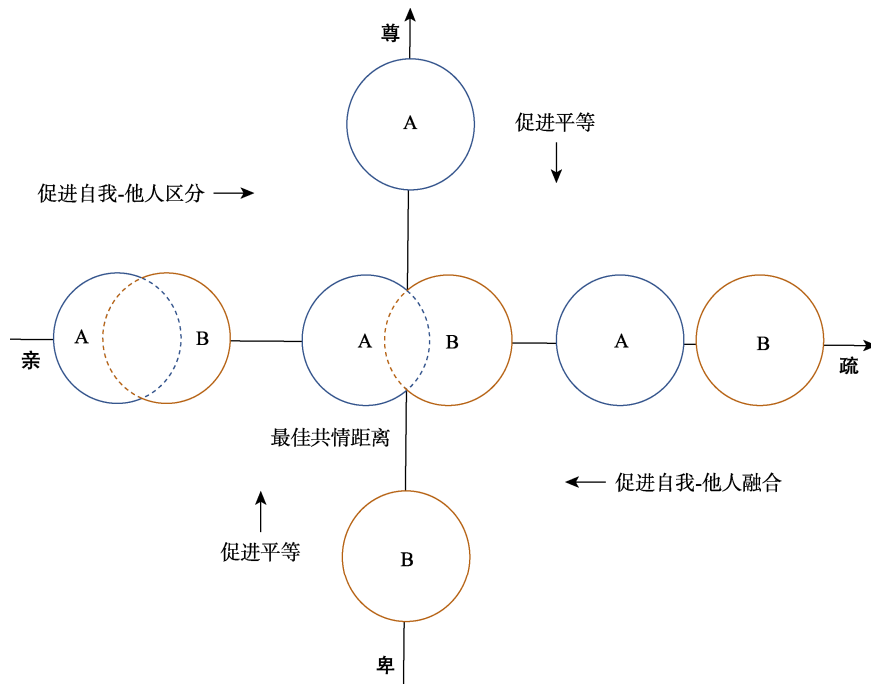


图 1 差序格局中的最佳共情距离

注：彩图见电子版

模拟、投射等不同生理或认知机制出发, 尝试解释一个人如何理解另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由此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Batson, 2009)。而在中国文化视野中, 共情并不被视为一种有待解释的个体心理机制。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气化感应”的生命观影响下, 共情被看作一种根植于存在本身的自然显现, 源自人与天地万物在本体层面上的相通共感(梁漱溟, 2011)。这种以“感通”为基础的共情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 呈现为一种本体性与道德性相融的情感。无论是孟子强调的“恻隐之心”, 还是王阳明提出的“一体之仁”, 其根基皆不在于对他者心理的推断或模拟, 而是源于对“天地万物本为一体”这一实在的直接体认与生命共振。除此之外, 在中国文化脉络中, 也不乏与西方共情类似的情感互动与道德实践概念。例如, 西方心理学概念中的认知共情在儒家思想中有对应的“推己及人”、“忠恕之道”; 情感共情则类似“恻隐之心”、“一体之仁”(李玮等, 2017); 行为共情亦可参照“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等准则。

中国文化下的共情实践需要置于具体的、差序化的人伦关系中理解, 其表达强度、表现方式

以及所承载的道德责任均随关系的亲疏和尊卑属性而动态变化。例如, 同情、怜悯往往隐含自上而下的关怀意味(Goetz et al., 2010; Oveis et al., 2010), 其表达须符合身份伦理; “仁爱”亦非一般的情感共鸣, 而常依循“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展逻辑, 体现出鲜明的差序特征(阎云翔, 2006)。儒家伦理以“仁”为内在的情感依据, 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 二者共同塑造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共情模式, 其特点可概括为: 情感表达上的含蓄与间接、认知方式上的整体性与理性化以及实践上的行动化与问题解决取向。这些特点与亲疏和尊卑两个关系维度的运作逻辑密切相关, 以下将围绕这三点对中国文化中的共情表达特点展开系统论述。

其一, 含蓄间接的情感表达。在亲疏维度上, 中国人的情感常被视为私密之事, 是含蓄不外露的(吕坤维, 2015/2019)。在陌生或公开场合, 个体倾向于克制情绪表露, 因而对陌生人的共情常表现为了然于心的体察、不打扰的尊重或含蓄善意的帮助, 点明对方的情绪并表达理解的方式反而可能是冒犯的。而对于亲密的人, 强烈的个人痛苦可能导致个体回避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精确识别

和体验, 转而通过理性化或行为支持的方式传递理解和支持。例如, 研究发现, 相较于表达共情, 中国人更多采用安慰、建议等方式回应处于痛苦中的个体(高亚蕾, 2021; 马璐瑶, 2020)。在尊卑维度上, 礼仪规范进一步制约了共情表达, 直白的情感流露可能被视为失礼或破坏秩序。因此, 中国文化中的共情之“情”常常处于一种未被言明但被理解的背景状态, 不一定通过对情绪的明确表征和言语表达来体现。这种情感的含蓄性和间接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东亚高语境文化的特点(吕坤维, 2015/2019)。

其二, 整体性与理性化的认知方式。中国文化中的自我是场域性的, 个体始终处于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中, 需持续关注自身在亲疏与尊卑坐标中的相对位置。这使得共情并不仅是对于共情对象身心体验的同感, 还需具备从整体处境出发的视野, 将其置于包含角色、责任与情境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理解(王东美, 2022)。因而, 中国人倾向于以辩证和折中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冲突和情绪体验(Varnum et al., 2010; Yama & Zakaria, 2012)。这种整体与理性并重的共情方式, 实为“礼”与“理”的结合, 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人际和谐与伦理秩序的重视。另一方面, 理性化的回应方式也使个体免于直接谈论情感, 符合中国人含蓄间接的情感特点。

其三, 问题解决导向与行动化。这一特点与中国人关系中自我他人边界的弹性和模糊密切相关。关系越亲近, 个体越将对方视为“自己人”, 愿意为彼此的境遇承担更多责任(Yu & Chaudhry, 2024), 共情因而更易转化为切实的助人行为(古若雷等, 2025; Maner & Gailliot, 2007; Stürmer et al., 2005)。如吕坤维(2015/2019)所言, 这种共情本质上是亲密关系中的“心疼”体验向其他关系对象的延伸, 因此体现为感知他人痛苦并施以照料、保护的行为冲动。夏萌(2022)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中国人在亲密关系中表达共情较少与个体认为共情表达帮助程度较低有关, 体现了中国式共情的实用主义特点。另一方面, 在尊卑维度上, 伦理角色直接规定了情感表达的行为义务。例如, “父慈子孝”是源于角色身份的、有明确实践指向性的情感和行为规范: 父对子的“慈”需要落实为用心的养育与教导, 子对父的“孝”则要体现在尊敬与侍奉中。父子之间的共情与理解不是停留在情感层

面, 更要体现为相应的行为实践, 正所谓“行胜于言”。可见, 无论是亲疏关系中的责任内化, 还是尊卑秩序下的行为规范, 均促使中国人的共情表达走向问题解决导向与行动化。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差序格局理论中的亲疏与尊卑维度, 整合西方共情研究的主要成果, 系统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共情现象的独特形态与内在张力。具体而言, 西方的共情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面临双重挑战: 其一, 中国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自我-他人融合倾向与共情所要求的清晰的自我边界之间存在冲突; 其二, 中国文化中的尊卑秩序与人伦规范与共情所要求的平等关系存在冲突。这些冲突凸显出中西方文化在共情的内涵认知与实践方式上存在深刻差异, 亟待更深入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

从文化心理学视角来看, 共情研究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文化敏感性的理论框架, 以真正囊括跨文化情境中的共情多样性。尽管共情所涉及的生理和神经机制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 但其在人际互动中的产生过程和表达方式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差异(Cheon et al., 2010)。因此, 共情应当被视为一种嵌入于特定社会关系与伦理秩序中的情境化实践。民族志研究显示, 虽然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类似共情的社会知觉与情感回应方式, 却鲜有与西方“empathy”完全对等的概念(Hollan, 2012)。共情作为一个总括性范畴, 涵盖情绪感染、同情和怜悯等相关但存在差异的心理过程(Batson et al., 1987; Cuff et al., 2016; Preston & de Waal, 2002)。Ickes (2003)提出, 这类术语的差异基本集中在对目标对象情绪状态的认知表征程度、情绪分享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维持自我-他人区分三个维度上, 并且西方的共情通常处于各维度的中间。与之相比,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共情在这三个维度上则处于不同的位置: 在认知上不强调对共情对象情绪的精细分辨与表达, 认知表征程度较低; 在情感上易于对内群体成员产生高度共鸣与被动卷入, 情感分享程度较高; 在自我建构上倾向于模糊的自我-他人边界, 自我-他人区分程度较低。未来需要更多这样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将不同文化中的共情形态整合到一起, 以促进对共情现象的理解和深入。

与此同时,当前亟须推进真正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构建更契合中国文化心理现实的共情理论体系。如黄光国(2019)所倡导的,华人学者应有投身本土化运动的文化自觉,通过发展本土心理学来建构一种既能阐释人类共通心理机制,又能说明特定文化心态的“含摄文化的理论”,从而引导心理学研究从文化比较转向文化诠释。本文提出的差序格局视角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共情的参考框架,未来研究可以系统考察中国人在“亲疏-尊卑”维度下对家人、熟人、生人以及上位者、平位者、下位者等不同关系对象的共情差异,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并在深入理解中国人特有的共情表达方式的基础上,设计更具文化适应性的共情训练方法,用以促进特定情境与特定人群的共情表达。

在文化交融与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我关系建构与情感表达范式既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反观自身文化传统的新视角(Ren & Xie, 2022; Yan, 2016),也带来了文化认同与心理适应上的挑战。若不经批判地套用西方理论框架,极易将文化差异误读为“共情缺陷”,从而忽视中国人的共情表达。现实生活中,此类文化错位已引发诸多社会心理问题。例如,在家庭中出现的代际共情隔阂:年轻一代在个人主义影响下倾向情感表达与自我确认,而老一辈仍秉持“行胜于言”的传统模式,两者之间的文化逻辑冲突如果缺乏理解与调适,便可能转化为实际的情感创伤(Leung & Chen, 2009)。因此,深入理解文化如何塑造共情,不仅有助于在家庭、职场等情境中灵活调整人际距离与回应方式,也有利于在文化对话中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心理健康促进功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 翟学伟. (2018). 儒家式的自我及其实践: 本土心理学的研究.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124-134.
- 丁凤琴, 陆朝晖. (2016). 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4(8), 1159-1174.
- 费孝通. (1948). *乡土中国*. 上海观察社.
- 高亚蕾. (2021). 大学生非专业心理助人行为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古若雷, 何越, 崔芳. (2025). 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再思考. *科学通报*, 70(8), 982-990.
- 管延华, 迟毓凯. (2006). 自我参照与朋友参照对人格特质记忆的影响. *心理科学*, 29(2), 448-450.
- 黄光国. (1985). 人情与面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3), 55-62.
- 黄光国. (1995). *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 台北: 心理出版社.
- 黄光国. (2014). “道”与“君子”: 儒家的自我修养论.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3(3), 166-176.
- 黄光国. (2019). 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 由文化“复建”到文化“复兴”. *心理学探新*, 39(5), 387-392.
- 江光荣. (2012). *心理咨询的理论实务* (第二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玮, 王振东, 蔡宝鸿, 杨晓峰, 申荷永. (2017). 儒家文化中的共情观. *心理学探新*, 37(6), 483-488.
- 梁漱溟. (2011). *梁漱溟先生讲孔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陆洛. (2003). 人我关系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现身.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 139-207.
- 吕坤维. (2019). *中国人的情感: 文化心理学阐释* (谢中垚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著 2015 年出版)
- 马璐瑶. (2020). 自我-他人区分与重叠对助人反应方式及共情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马戎. (2007). “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2), 131-142.
- 王东美. (2022). 历史的共情——基于中国知识传统的心理治疗可能. *开放时代*, (4), 129-139+9.
- 王振东. (2021). 中国人的差序性利他: 自我建构的作用及机制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 夏萌. (2022). 亲密关系对非专业心理助人中共情反应的影响及机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阎云翔. (2006).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社会学研究*, (4), 201-213, 245-246.
- 阎云翔. (2021). “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 *探索与争鸣*, (10), 46-59, 177-178.
- 杨国枢. (1992).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 社会互动的观点. 见杨国枢, 余安邦 (编).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理论与方法篇* (p.106).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 杨雪. (2023). 亲密关系对共情过程的影响——基于多项式加工树模型的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尹娜. (2024). 社会等级对共情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视角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袁晓劲, 郭斯萍. (2017). 中国人人际情感的差序格局关系: 来自 EAST 的证据. *心理科学*, 40(3), 651-656.
- 张江华. (2010). 卡里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社会杂志*, 30(5), 1-24.
- 张力, 周天罡, 张剑, 刘祖祥, 范津, 朱滢. (2005). 寻找中国人的自我: 一项 fMRI 研究. *中国科学C 辑: 生命科学*, 35(5), 472-478.
- 周丽, 苏彦捷. (2008). 实际亲密度对恋人参照效应的影响. *心理学报*, 40(4), 487-495.
- 庄耀嘉, 杨国枢. (1997). 角色规范的认知结构. *本土心理学研究*, (7), 282-338.
- Aron, A., & Aron, E. N. (2010). Rusbult's investment model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elf-expansion model.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2), 152-154.

- Aron, A., Aron, E. N., Tudor, M., & Nelson, G. (1991). Close relationships as including other in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2), 241–253.
- Atkins, D. (2014). *The role of culture in empathy: The consequences and explanati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at the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leve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ent-Canterbury.
- Azevedo, R. T., Macaluso, E., Avenanti, A., Santangelo, V., Cazzato, V., & Aglioti, S. M. (2013). Their pain is not our pain: Brain and autonomic correlates of empathic resonance with the pain of same and different race individuals. *Human Brain Mapping*, 34(12), 3168–3181.
- Batson, C. D. (2009). These things called empathy: Eight related but distinct phenomena. In J. Decety & W. Ickes (Eds.), *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pp. 3–15). Boston Review.
- Batson, C. D., Fultz, J., & Schoenrade, P. A. (1987). Distress and empathy: Two qualitatively distinct vicarious emotions with different motivation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5(1), 19–39.
- Batson, C. D., & Shaw, L. L. (1991). Evidence for altruism: Toward a pluralism of prosocial motive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2), 107–122.
- Bucchioni, G., Lelard, T., Ahmaidi, S., Godefroy, O., Krystkowiak, P., & Mouras, H. (2015). Do we feel the same empathy for loved and hated peers? *PLOS ONE*, 10(5), e0125871.
- Cassels, T. G., Chan, S., Chung, W., & Birch, S. A. J. (2010). The role of culture in affective empathy: Cultural and bicultur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10(3–4), 309–326.
- Cheon, B. K., Im, D., Harada, T., Kim, J.-S., Mathur, V. A., Scimeca, J. M., ... Chiao, J. Y. (2011). Cultural influences on neural basis of intergroup empathy. *NeuroImage*, 57(2), 642–650.
- Cheon, B. K., Mathur, V. A., & Chiao, J. Y. (2010). Empathy as cultural process: Insights from the cultur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World Cultural Psychiatry Research Review*, 5(1), 32–42.
- Chiao, J. Y. (2010). Neural basis of social status hierarchy across species.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20(6), 803–809.
- Chiao, J. Y., Mathur, V. A., Harada, T., & Lipke, T. (2009). Neural basis of preference for human social hierarchy versus egalitarianism.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67, 174–181.
- Chopik, W. J., O'Brien, E., & Konrath, S. H. (2017). Differences in empathic concer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across 63 countri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8(1), 23–38.
- Cialdini, R. B., Brown, S. L., Lewis, B. P., Luce, C., & Neuberg, S. L. (1997). Reinterpreting the empathy-altruism relationship: When one into one equals on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3), 481–494.
- Coplan, A. (2011). Will the real empathy please stand up? A case for a narrow conceptualizatio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9(s1), 40–65.
- Cuff, B. M. P., Brown, S. J., Taylor, L., & Howat, D. J. (2016). Empathy: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Emotion Review*, 8(2), 144–153.
- Davis, M. H., Conklin, L., Smith, A., & Luce, C. (1996). Effect of perspective taking on th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of persons: A merging of self and oth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4), 713–726.
- Decety, J., & Lamm, C. (2006). Human empathy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neuroscience.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6(6), 1146–1163.
- Depow, G. J., Francis, Z., & Inzlicht, M. (2021). The experience of empathy in everyday life.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8), 1198–1213.
- Eklund, J. H., & Meranius, M. S. (2021). Toward a consensus on the nature of empathy: A review of reviews.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104(2), 300–307.
- Eres, R. (2022). The role of group membership in modulating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empathy. In P. Molenberghs (Ed.), *The neuroscience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the neural underpinnings of intergroup behaviour, ingroup bias and prejudice* (p. 16). Routledge.
- Ferguson, A. M., Cameron, C. D., & Inzlicht, M. (2020). Motivational effects on empathic choi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0, Article 104010.
- Fiske, A. P. (1992).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sociality: Framework for a unified theory of social rela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99(4), 689–723.
- Fowler, Z., Law, K. F., & Gaesser, B. (2021). Against empathy bias: The moral value of equitable empathy.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5), 766–779.
- Friedman, S. L. (2005). The intimacy of state power: Marriage, liberation, and socialist subjects in southeastern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2(2), 312–327.
- Fu, X., Padilla-Walker, L. M., Nielson, M. G., Yuan, M., & Kou, Y. (2021). The effect of target's power on prosocial behavior: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Psychology*, 155(1), 115–128.
- Galinsky, A. D., Ku, G., & Wang, C. S. (2005). Perspective-taking and self-other overlap: Fostering social bonds and facilitating social coordina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8(2), 109–124.
- Galinsky, A. D., Magee, J. C., Inesi, M. E., & Gruenfeld, D. H. (2006). Power and perspectives not tak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12), 1068–1074.
- Galinsky, A. D., & Moskowitz, G. B. (2000). Perspective-taking: Decreasing stereotype expression, stereotype accessibility, and in-group favorit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4), 708–724.
- Goetz, J. L., Keltner, D., & Simon-Thomas, E. (2010). Compassion: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view.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3), 351–374.
- Gutsell, J. N., & Inzlicht, M. (2012). Inter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sharing of emotive states: Neural evidence of an empathy gap.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7(5), 596–603.
- Han, M., Kim, H. J., & Yoshiyuki, I. (2016). Differed self within collectivist culture: Introducing an alternative self-construal theory. *Studies in Asian Social Science*, 3(1), 37–53.
- Han, S. (2018). Neurocognitive basis of racial ingroup bias in empath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2(5), 400–421.
- Han, S., Ma, Y., & Wang, G. (2016). Shared 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self and conjugal family members in Chinese brain. *Culture and Brain*, 4(1), 72–86.
- Hill, C. E. (2019). *Helping skills: Facilitating exploration, insight, and action* (5th ed.).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Ho, A. K., Sidanius, J., Kteily, N., Sheehy-Skeffington, J., Pratto, F., Henkel, K. E., ... Stewart, A. L. (2015). The nature of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Theorizing and measuring preferences for intergroup inequality using the new SDO7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6), 1003–1028.
- Hogeveen, J., Inzlicht, M., & Obhi, S. S. (2014). Power changes how the brain responds to oth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2), 755–762.
- Hollan, D. (2012). Emerging issues in the cross-cultural study of empathy. *Emotion Review*, 4(1), 70–78.
- Hudson, S. T. J., Cikara, M., & Sidanius, J. (2019). Preference for hierarchy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empathy and increased counter-empathy towards others, especially out-group targe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5, Article 103871.
- Hwang, K.-K. (2001). The deep structure of confucianism: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Asian Philosophy*, 11(3), 179–204.
- Ickes, W. (2003). *Everyday mind reading*. Prometheus Books.
- Keltner, D. (2016). *The power paradox: How we gain and lose influence*. Penguin Press.
-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2), 265–284.
- Kikutani, M., Ikemoto, M., Park, E.-J., & Rogers, K. (2024).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variations within the collectivistic cultural sphere: Comparing Japanese and Koreans' self/other views and the influence on emotion processing.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4(2). Article 4.
- Kim, H., & Han, S. (2018). Does personal distress enhance empathic interaction or block i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4, 77–83.
- Klimecki, O. M. (2019). The role of empathy and compass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 *Emotion Review*, 11(4), 310–325.
- Kraus, M. W., Cô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716–1723.
- Krol, S. A., & Bartz, J. A. (2022). The self and empathy: Lacking a clear and stable sense of self undermines empathy and helping behavior. *Emotion*, 22(7), 1554–1571.
- Lammers, J., Galinsky, A. D., Gordijn, E. H., & Otten, S. (2008). Illegitimacy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power on approach.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6), 558–564.
- Lammers, J., Galinsky, A. D., Gordijn, E. H., & Otten, S. (2012). Power increases social distanc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3(3), 282–290.
- Leary, T. (1957). *Interpersonal diagnosis of personality*. Ronald Press.
- Lehmann, M., Genzer, S., Kassem, N., Van Tongeren, D. R., & Perry, A. (2026). Intellectual humility predicts empathic accuracy and empathic resili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52(6), 1463–1481.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41313427>
- Leung, S. A., & Chen, P. H. (2009).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sia: Indigenous, multi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consideration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7(7), 944–966.
- Li, H., Wang, G., Zhang, E., Shi, H., & Huang, W. (2022). Cognitive cost of empathizing with mothers and strangers by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Heliyon*, 8(9), e10306.
- López-Solà, M., Koban, L., Krishnan, A., & Wager, T. D. (2020). When pain really matters: A vicarious-pain brain marker tracks empathy for pain in the romantic partner. *Neuropsychologia*, 145, Article 106427.
- Lucas, B. J., & Kteily, N. S. (2018). (Anti-)egalitarianism differentially predicts empathy for members of advantaged versus disadvantaged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4(5), 665–692.
- Magee, J. C., & Galinsky, A. D. (2008). Social hierarchy: The self-reinforcing nature of power and statu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1), 351–398.
- Maner, J. K., & Gailliot, M. T. (2007). Altruism and egoism: Prosocial motivations for helping depend on relationship contex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7(2), 347–358.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 Meyer, M. L., Masten, C. L., Ma, Y., Wang, C., Shi, Z., Eisenberger, N. I., & Han, S. (2013). Empathy for the social suffering of friends and strangers recruits distinct patterns of brain activa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8(4), 446–454.
- Meyer, M., Masten, C. L., Ma, Y., Wang, C., Shi, Z., Eisenberger, N. I., ... Han, S. (2015). Differential neural activation to friends and strangers links interdependence to empathy. *Culture and Brain*, 3(1), 21–38.
- Oveis, C., Horberg, E. J., & Keltner, D. (2010). Compassion, pride, and social intuitions of self-other similarity. *Journal*

-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4), 618–630.
-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 3–72.
- Preston, S. D., & de Waal, F. B. M. (2002). 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1), 1–20.
- Redhead, D., & Power, E. A. (2022). Social hierarchie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huma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7(1845), 20200440.
- Ren, Z., & Xie, Z. (2022). The journey of individu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patients treated by western psychoanalysts in online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70(4), 733–754.
- Sidanius, J., Kteily, N., Sheehy - Skeffington, J., Ho, A. K., Sibley, C., & Duriez, B. (2013). You're inferior and not worth our concern: The interface between empathy and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1(3), 313–323.
- Singer, T., & Klimecki, O. M. (2014). Empathy and compassion. *Current Biology*, 24(18), R875–R878.
- Stellar, J. E., Manzo, V. M., Kraus, M. W., & Keltner, D. (2012). Class and compassion: Socioeconomic factors predict responses to suffering. *Emotion*, 12(3), 449–459.
- Stürmer, S., Snyder, M., & Omoto, A. M. (2005). Prosocial emotions and help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roup member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3), 532–546.
- Taylor, S. E., Sherman, D. K., Kim, H. S., Jarcho, J., Takagi, K., & Dunagan, M. S. (2004). Culture and social support: Who seeks it and w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3), 354–362.
- Triandis, H. C. (2001).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9(6), 907–924.
- Triandis, H. C., Bontempo, R., Villareal, M. J., Asai, M., & Lucca, N. (1988).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elf-ingroup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2), 323–338.
- Utevsky, A. V., & Platt, M. L. (2014). Status and the brain. *PLOS Biology*, 12(9), e1001941.
- van Kleef, G. A., Oveis, C., van der Löwe, I., LuoKogan, A., Goetz, J., & Keltner, D. (2008). Power, distress, and compassion: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2), 1315–1322.
- Varnum, M. E. W., Grossmann, I., Kitayama, S., & Nisbett, R. E. (2010). The origi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The social orientation hypothesi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 9–13.
- Vorauer, J. (2013). 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perspective-taking. In J. M. Olson & M. P. Zanna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59–115).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 Wang, F., Kessels, H. W., & Hu, H. (2014). The mouse that roared: Neural mechanisms of social hierarchy.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37(11), 674–682.
- Woolrych, T., Eady, M. J., & Green, C. A. (2020). Authentic empathy: A cultur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in children.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64(5), 954–973.
- Wuyun, G., Shu, M., Cao, Z., Huang, W., Zou, X., Li, S., ... Wu, Y. (2014). 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and the mother for Chinese individuals. *PLOS ONE*, 9(3), e91556.
- Yama, H., & Zakaria, N. (2012). Inference and cultur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ow context culture and high context culture as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Cognitive Science*, 34(34), 2552–2557.
- Yan, Y. (2016). Intergenerational intimacy and descending familism in rural north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8(2), 244–257.
- Yu, J., & Chaudhry, S. J. (2024). "Thanks, but no thanks": Gratitude expression paradoxically signals dist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1), 58–78.
- Zhu, X., Yang, X., & Ma, L. Y. (2025). Empath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role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Psychotherapy Bulletin*, 60(2), 20–25.
- Zhu, Y., & Han, S. (2008).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self: From philosophy to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5), 1799–1811.
- Zink, C. F., Tong, Y., Chen, Q., Bassett, D. S., Stein, J. L., & Meyer-Lindenberg, A. (2008). Know your place: Neural processing of social hierarchy in humans. *Neuron*, 58(2), 273–283.

Empath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role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ZHU Xu, YANG Xue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Empathy, as an interpersonal respons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context. However, the specific ways in which Chinese culture influences empathic processes remain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Drawing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haxu geju*),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timacy-distance” (*qin-shu*) and “hierarchy-status” (*zun-bei*) shape empathy. In the intimacy-distance dimension, the high degree of rel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ollectivistic cultures may blur the psychological boundaries essential for empathy. In the hierarchy-status dimension, the Confucian ethical order, grounded in stratified social relations, may conflict with the egalitarian stance required for empathic engagement. Overall, empathy with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demonstrates three key characteristics: indirect and implicit emotional expression, holistic and rationalized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a problem-solving, action-oriented focu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culture-sensitive guidanc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empathic practice in daily life.

Keywords: empathy, Chinese cultur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timacy-distance, hierarchy-status